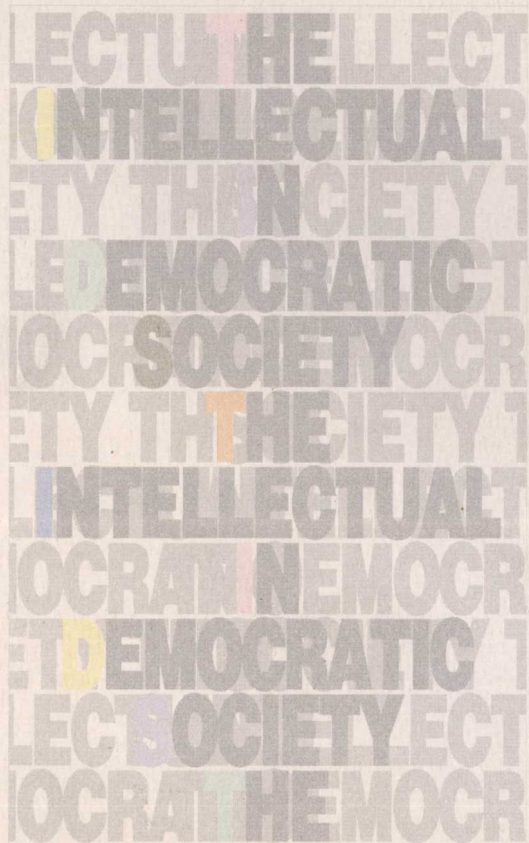


“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杰弗里·C·戈德法布 著

杨信彰 周恒译

加洛校

Cambridge Collection
剑桥集粹

“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

杰弗里·C·戈德法布 著

杨信彰 周 恒 译

加 洛 校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06-2001-7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美)戈德法布(Goldfarb, J. C.)著;杨信彰等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6

(剑桥集粹)

书名原文: Civility and Subversion

ISBN 7-5382-6386-1

I.民… II.①戈…②杨… III.知识分子—作用—研究—美国 IV.D77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2700号

Civility and Subversion

Copyright© Jeffrey C. Goldfarb 1998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2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印刷 辽宁省印刷技术研究所

版次 200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1/32

印张 9

字数 220千字

印数 1-3000册

定价 18.00元

作者 杰弗里·C·戈德法布

译者 杨信彰 周恒

审校 加洛

特约编辑 谢翰如

责任编辑 严中联

责任校对 马慧

封面设计 吴光前

版式设计 赵怡轩

内容简介

本书对现代社会，主要是美国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叙述和分析。作者运用传统的和当代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各种活跃的知识分子群体，时间跨度很大，从生活在5世纪雅典的苏格拉底，到生活在20世纪美国的杜威、李普曼、马尔科姆·艾克斯，直到中东欧的一些知识分子。作者首先界定什么是知识分子。他指的不是白领、专业人员甚至科学家。他认为知识分子应是社会人物，他们促使社会思考和讨论共同的问题，不仅促使这种讨论文明地进行，而且打破那些禁锢人们思想的世俗陈规和意见。使文明和颠覆两者处于适当的平衡局面是知识分子应取的上策。书中讨论了精英治国和专家治国的利弊。认为将知识分子视为民主的卫士或社会进步的障碍均有失偏颇。

本书作为学术著作，对于我国相关专业学者和教学人员了解知识分子在西方“民主”社会中的作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读者应特别注意，书中作者界定的知识分子与我国通行的知识分子概念完全不同，书中所说的民主指的是西方的民主，与我国的民主在含义上也是有差别的。

杰弗里·西·戈德法布是纽约市社会研究新校研究生部的社会学教授和民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和学术论文，还撰写了6本专著：《剧变之后》（1992）、《开放性》（1989）和《论文化自由》（1982）。

本书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承蒙菲律宾许自钦先生的支持帮助，特此致谢。

——译者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世纪末的知识分子	1
第二章 谁是知识分子？	23
第三章 文明的知识分子和公众	48
第四章 颠覆型知识分子和公众	64
第五章 文明社会的理想	90
第六章 剧变后的知识分子和文化政治	117
第七章 大 学	139
第八章 种族和离题的中断	160
第九章 种族和持久的思考	177
第十章 剧变后为什么没有女权主义？	199
第十一章 结论：悲观怀疑时代的文明与颠覆	221
注释	240
参考文献	259
索引	271

第一章

引言：世纪末的知识分子

我认为知识分子在促进“民主”和进行各种“民主”生活实践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还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减少对“民主”是一大威胁。知识分子是实践“民主”的主要群体，如果他们离开政治舞台，“民主”实践就会以失败而告终。我有这些看法，而且现在这些看法令人感到尤其真切，因为我发觉知识分子特别能满足“民主”社会最为迫切的需要之一——思考共同的问题的需要。

知识分子促使各种社会讨论各自的问题。他们促使政治争论文明地进行，他们推翻了令人沾沾自喜的一统意见，他们断定有可能使互为敌人的人变为对手，并为他们提供这种可能性；他们促使公众讨论被文明准则掩盖的各种问题；他们的这些作为就是对“民主”生活的贡献。这就是本书要探讨的主题。知识分子是促进“民主”的主要力量，因为他们发起了对迫切的社会问题进行开明的讨论，并通过在公众生活中培植文明，促使打破禁锢人们思想的常规来完成所扮演的角色。

为了充分探讨这个主题，在调查研究中我们会考虑到在“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行动的两难处境和复杂性。我将试图把

知识分子当作与众不同的社会活动分子来描写(第二章),并描述他或她是如何建立一个公众的社会活动领域的(第三、第四章)。随着探讨的深入,“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地位将得到更充分的描写。在结语中我们将充分地描述当代社会中的民主知识分子。

这不是一个单刀直入式的正式探讨,我将考虑知识分子如何看自己在社会中的行动,据此给他们下一个社会学范畴的定义。这将使我们把苏格拉底看作传统“民主”中的古典知识分子的原型(第二章),也将使我们认真地审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前后的知识分子(第五、第六、第十章)。在调查研究美国知识分子的情况时,这些问题将被当作具有相对可比性的问题来探讨。

我们审视着活跃的知识分子:随着大众社会的发展,他们努力消除公众生活中的弊病,正如约翰·杜威和沃尔特·李普曼在20世纪上半叶所做的那样(第三章);他们试图打破权力和等级制度的各种限制,正如C.赖特·米尔斯和爱德华·赛义德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那样(第四章);随着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遭受挫折,他们在重新引进西方文明社会的理想时,杜撰或重新杜撰了政治词汇,正如参与某种自由主义的、世界性的反叛活动的知识分子所做的那样(第五章);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能了解“民主”社会里的知识分子。独立于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文化生活将被证明是知识分子自由生活的必要条件——一个值得创造的必要条件,它是在剧变后的欧洲,活跃的知识分子首要关切的问题(第六章)。但是文化机构,如美国大学,如果过于独立的话,我会认为这本身就有危险,会导致政治争论的理想化,正如在争论政治的正确性时可被觉察到的那样(第七章)。然而,即使有美国大学的那些问题,我们还是看到知识分子在致力于解决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如种族问题等,手段

有二：一是打破各种文化方面的清规戒律，正如马尔科姆·艾克斯所做的那样(第八章)，二是一丝不苟地致力于确立对媒体事件进行更有思想、更加文明的讨论，正如一群学者在对克拉伦斯·托马斯的批准任命听证会作出反应时所做的那样(第九章)。我认为，使文明和颠覆处于适当平衡的局面是民主知识分子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将看一看正在取得这种平衡局面的中欧国家里的男女平等主义运动的情况(第十章)。

思考的缺陷

介绍“民主”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是对现时问题的一种反应，我在介绍时，并非仅仅描写一下知识分子已干过什么事。我不想描写性地概述当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情况，¹而想阐明知识分子在支持“民主”生活时会干什么。我自己意识到我是把对“民主”和知识分子的情况进行经验性的调查和规范性的调查结合起来探讨的。我相信他们(我们)特别能解决我们政治文化中的问题，不过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遇到现今独有的问题时，我们(自己)就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它们。

在我们遇到的问题中，当代“民主”社会里公开讨论的质量的低劣是我最为担忧的问题。生活在“民主”社会的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思考缺陷”。问题不在于没有交流信息，实际情况显然相反。我们的世界已是一个拥有电子信息高速公路的世界，拥有公众和个人问题的巨大数据库。但是，信息并不会自动产生出开明的讨论。有关每件事和每个人的零碎的种种事实通过新旧技术的传播，纷至沓来，目不暇接。信息已成为权力和财富的首要基础，它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然而，“民主”社会的公民及其代理人要持续深思熟虑地考虑“民主”社会所

遇到的问题却变得更为困难。我们很懂得如何加工信息，而且做得越来越好，但是，当我们在考虑要加工的信息时，尤其是对其进行磋商时，也会有极其困难的时候。因此，我有这样的看法：知识分子是很重要的，他们关系到事情的成败。要是他们没有促使人们对我们遇到的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那么就没有人会这样做了。

要是没有这样的讨论，“民主”政府就无法慎重行事。日常的政府行为就会变成大众操纵的战略运动——一个当代“民主”国家里众所周知的情况。政府工作的制定不仅其形式而且其内容都是为了迎合民众的偏见的。他们随便轻易地许下诺言，这些诺言就是一揽子计划，易于提纲挈领，便于改成电视用语。一般民众是以他们选择肥皂牌子的方式来作出政治抉择的。从莫斯科到利马，从米兰到东京、到达拉斯，似乎到处都是以玩世不恭和浑浑噩噩为政治游戏的总规则。正如我们在本书结语部分观察到的那样，当今知识分子与玩世不恭的交锋产生出了特别的困境和机会。

在下面几章里，我会说明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使讨论具体的问题成为可能来支持“民主”社会的，以及他们是如何使超越到处可见的政治上的浑浑噩噩和玩世不恭成为可能的。我会抵制给知识分子分配单一角色的理论诱惑，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这样做的。我认为知识分子为支持“民主”而做的事情在具体的情景中都是很具体的。但是我的确还相信，对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进行理智的、持久的和有效的讨论，是知识分子角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当他或她为“民主”生活的创立作出贡献时更是如此；我还相信当代“民主”社会迫切需要这种讨论。

现在严肃的讨论遭到排挤还算是好的了，最糟的是遭到压

制。如果是高压政权统治国家，常见的就是压制讨论。但是在像美国这样“开明“民主””的国家里，市场经济的运作往往就能说明这一点，尤其是当它通过电视和电台广播运作的时候更是如此。²商业电视和电台广播经常会出现一些轰动一时的新闻以及大声叫嚷的特写头像。现在越来越难区分通俗的报章杂志和严肃报章杂志。丑闻和道听途说可以说是通俗报章杂志的合适素材，现在正成为据说是更加严肃的节目的主要题材。这不仅说明报章杂志的标准降低了，而且也说明人们正在怀疑这些标准的观念。新闻与娱乐的基本区别现在变得难以维持。谈到广播讨论，现场采访完善了对拳击比赛两位拳击手轮流报道的形式，其目的不是推理和说理，而是逗笑和逗乐。商业电视、公众电视和广播电台都有不紧不慢的现场采访节目，在所谓的报刊媒体里也有一些发表意见的著名刊物，更不必说书籍这种古老媒体了。但是这些东西遭到排挤，读者只是一些出类拔萃的“意见发表者”，而不是广大的普通民众。也许，这种情况说不上是异乎寻常的，不仅美国有，世界各地都有。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说不上是什么特别新的东西。毕竟，在《纽约时报》发展成为销售量最高的报纸的同时(19世纪末)，黄色的报刊杂志也被完善为一种受欢迎的形式；低级文学在格拉布街发展的同时(18世纪下半叶)，法国启蒙思想的大作也出版了。通俗消遣读物总是更流行，而内容高雅的读物却愈加没有吸引力。然而，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目前消遣读物与严肃读物之间的不确定关系，以及这种不确定关系对民众的思考与抉择的扭曲。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世界各地都可以看见平庸的政治决策。³

我相信知识分子能像他们过去做过的那样，提出一个对付这种情况的灵丹妙药，在公众生活方面贡献出有见识的重要的

智慧。正如我下面将说明的那样，这是自从苏格拉底以来知识分子一直在扮演的特殊角色。急需弄明白的问题是：他们将来会这样做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它不但要求更加清楚地了解谁是知识分子和他或她在复杂的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两个问题——下一章将讨论这两个问题，还要求了解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地方具体介入不同事情的结果。社会思想家一度把知识分子想象为在社会中扮演着领导的角色、起着领导作用的人，具体的例子有：列宁说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先驱，曼海姆说他们是各阶级争夺利益的独立裁决者，本达却说他们是真理的无私捍卫者。⁴现在这些说法在西方社会已经没有说服力了，甚至对于那些一直坚持其中之一立场直到最近才放弃的人也是如此。随着东、中欧发生剧变，上述观点的吸引力已有所减弱，甚至对于像墨西哥的萨帕狄斯塔斯那样的激进革命者来说也是如此。⁵在知识分子的作品及知识和文化想象力成了后工业社会的政权基础之后，人们就越发难以坚持社会上其他群体有自身利益而知识分子没有自身利益这种观点了。再者，作为一个在社会中实实在在独立存在的力量，在多种文化交融的后现代主义世界里，不参与争夺狭隘利益，这似乎只不过是合情理地要求特权而已。由于人们对这些相当普遍的、被归纳出来的基准性观点持怀疑态度，心中又明白知识分子的行动及其效果很可能会因场合的不同而不同，因此要描述“民主”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就要仔细考察他们在具体的场合中是如何行动的。

然而，有许多普遍的问题我想我们应该去研究。这些问题就是20世纪末知识分子常遇到的一串社会学范畴的问题。其中最基本的问题出自于“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紧张状况。

民主知识分子两种截然不同的地位

知识分子在“民主”社会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地位。一方面(开明的一面)，“民主”社会需要掌握卓越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实实在在地贡献出他们的专门知识、创造力和交流技巧。另一方面(平等的一面)，在“民主”社会里，人们以怀疑的眼光来看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卓越文化知识”。知识分子的地位是通过判断等级制来确立的。存在着论点好坏之分，作品优秀平庸之别，而知识分子的地位就取决于这类判断。不过，“民主”反复灌输给人们的却是，“民主”生来就怀疑把等级制度看作基本原理的观念。在我看来这种冲突似乎就是当前的“民主”经历的一部分，是“民主”生活中令人困惑的主要问题，它使知识分子在“民主”社会里的地位永远得不到确定。知识分子对于“民主”是爱恨交织，反之亦然。⁶

爱的这方面，或者说是相互依存的一面：“民主”就是人民统治国家，这要成为切实可行的统治方式，就需要见多识广、具有批评秉性的公民。为了追求明智统治这一理想，“民主”主义者不仅需要专门知识，而且需要知识分子文化活动中衍生出的规范性洞察力。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公众有机会参与由知识分子的争论引发的讨论。在“民主”社会里，有见识的公众必须能作出批评性的判断，有时必须能对复杂的事情作出这种判断。因此，知识分子应该参加公众生活，而同是公民的人，至少他们的代表，应该了解知识分子活动的成果。否则，某种暴政或寡头政治很可能变得愈加强大，愈加四处横行。“民主”政府如果不借用一切可利用的原始资料信息和正确的判断，就会被削弱。美国独立战争的发动者以及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开

创政治新局面的精英——明白无误地坚持着这一共和主义的观点，正如戈登·伍德鲜明强调的那样。⁷

但是，伍德也同样鲜明地说明这些精英的观点不是固定不变的。“民主”政府也许并不仇视知识分子，但是往往对他们深感怀疑。美国的缔造者期望有一批天生的优秀分子，一批知识分子精英(他们自己)，在公众事务中担任领导，以新生的，确切地说是18世纪末期新出现的一个精英领导阶级来取代腐败无能的旧统治集团。然而却是一支平均主义的生力军，托克维尔称其为一支“神助的力量”，推翻了旧统治集团，并打破了共和主义者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认可的统治集团的梦想。在迫不得已时，自耕农、机工和手工艺者会从同职业者中，或从其他职业者中，选择像安德鲁·杰克逊或马丁·范·布伦这样的人，被选的人最明白无误地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判断和偏见。然而，开明的知识分子的理解和平均主义者的理想在“民主”方面的对立状况，至少也可追溯到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国家诞生的头几年，而且从那以来就一直与我们相伴相随。

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许多美国社会观察家认为这种情况导致了文化昏暗局面。他们担心，既然“民主”是平均主义的，而文化，如艺术和科学，却是等级制的，那么优秀文化必然会被某种“民主”精粹所损害。对于平“民主”义意识较强的人来说，这个问题要以反映民意的方式来看。他们担心知识分子精英将会对民意和民俗施加决定性影响。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特持这一观点，⁸(更知名的)像美国前副总统丹·奎尔、威廉·贝内特和帕特·布坎南这样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同样地也持这一观点。左右翼民粹派都怀疑知识分子精英治国论。左翼民粹派这边，甘斯是个非常稳健的人，这种精英治国论被看作是授予特权阶级特权的因素，这个特权阶级在社会现状中已享有十足的利益。

右翼民粹派这边，知识分子精英被视为诋毁平民百姓的共同信仰和民风的一支国际性力量。

知识分子努力做到几乎是从每一个角度来面对这个问题。有些人，如甘斯，采取平“民主”义的立场；有些人，如右翼民粹派的希尔顿·克雷默⁹和左翼民粹派的欧文·豪¹⁰，选择了更加倾向精英治国论的立场，面对平庸的平民，捍卫起高雅文化。再者，知识分子的贡献不会仅仅以袒护某一方和明确有力地阐明一方或另一方的立场而告结束。知识分子把公众对问题的思考引向深入，在公众争论中起了一份作用。因此，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他写的《美国生活中的反唯理智论》和《政治中的多疑习性》这两本重要的书中讨论了平“民主”义的反唯理智论的问题；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在他的巨著《差别》中探讨了文化精英治国论如何颠覆“民主”的问题。¹¹

然而，学者的如此介入的确产生出自身的一些问题。他们的介入形式限制了他们的读者量；他们的著作绝大部分只有训练有素的公众才会去读，这些人要么文化水平高，要么接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平“民主”义的霍夫斯塔特具有让一般读者看得懂的文学才能，他的作品浅显易懂，完全不同于诸如布尔迪厄的作品那样的专业作品，确实对公众具有更大的潜在影响力。但是，不同的民族就有不同的情况。因此，大体上说，法国人对于抽象理论的忍受力要比英国人和美国人大得多，这是知识分子名人让-保尔·萨特在战后概括出来的；英国人却注重明晰，奥威尔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代表；而美国人却喜好一种更具预言性的口气，例如沃尔特·李普曼的作品。显然，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和一般民众的阅读方式影响了知识分子同平“民主”义的怀疑态度和精英治国论作斗争的方式。

在下面几章，我将遵循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问题、公众的不同期望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方式这一事实来探讨这场斗争。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各社会成员间试图相互交流，因此除了差别之外，范围广泛、情况复杂的不同社会的内在问题还是有一系列形式相同的东西的。知识分子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地位，结果，在“民主”社会里他们除要面对这些紧张状况外，还要面对大众传播媒体和大众文化方面的大量问题。

知识分子在大众社会中的行动

无论是在英国社会、法国社会、美国社会，还是在任何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里，显而易见，随着无线电广播、电话和电视成为社会信息传递的主要媒体，书面文字的作用就减小了。有些迹象表明，由于个人电脑日益重要，日益普及，人们会暂时地再次需要读写能力。但是看来好像一旦出现视听功能增强的新一代电脑，一般民众的读写能力虽然更加重要，却很快就会成为历史。不管读写能力是否又适度回升，显而易见，作家作为深受欢迎的信息传递者的中心地位已成历史。我们的小册子作家没有半个具有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同行的那种影响力。过去的狄更斯和马克·吐温是深受大众欢迎的作家，而20世纪的大小小说家已不是这回事了，还有，21世纪的小说家是否会像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在他们当时那样成为大众文化的中心，似乎也是件令人怀疑的事。这种情况给现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尽管他们一直被称做具有批评秉性的作家。

当然，人们可以论证这并非必然就意味着“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生活的结束。过去的许多知识分子并非首先就是作家。

苏格拉底，也许是他们中间最伟大的，却没有留下任何传世之作。在19世纪的美国，公开演讲和辩论是知识分子交流思想的主要形式。因此，电视、无线电广播和电影已成为社会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并不一定会令知识分子担心。人们甚至会认为我们的一些大知识分子应该使用这些媒体或出现在这些媒体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电视和电台并非必然就意味着知识分子生活的结束。

但是，还有一些严肃的问题必须处理。那些认为批评知识分子的生活是由大众传播媒体来维持的人，如安德烈·罗斯、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必须面对大众媒体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给公众讨论和批评知识分子可能的活动带来了很大的限制这个事实。¹²公众的讨论和知识分子的活动是由有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来界定的，传播媒体的声音感染力取代了理由充分的论点，传播媒体被有成效地使用压倒了原则性很强的政治，传播媒体的名人同闻名遐迩的成就混淆不清。这种情况往往让批评知识分子无能为力，不得不屈服。

大众文化和大众政治的批评家长时间来一直在关心着这些问题。对大众的批评一开始显然包含着对“民主”发展的保守反应。奥尔特加-加塞特的文学名著《民众叛乱》给人的印象是平民百姓突然侵占了文明的机构。¹³在戏院和其他公共文化场所，粗俗的“门外汉”正坐在非常高雅的人旁边，仅仅这一事实就会引起人们的担心。尽管后来对大众社会和文化的批评矛头转向一些截然不同的事情，我在此努力突出强调的也是现代“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像马克斯·霍尔克海姆、西奥多·阿多诺、于尔根·哈马斯和汉娜·阿伦特这样的思想家，对大众传播媒体和大众文化的批评并非主要集中于那些参加公众生活而未受过教育的粗人，而是主要集中于受条